学术专论

“类书”与晚明清初学术衔接的痕迹

——一个学术史与书籍史的综合研究

张　循

[摘要]　在明人学问里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类书”，直到清初仍隐显于学问世界的广阔背景中。清初士人常以编辑一部类书为其学术抱负，顾炎武著名的“采山之铜”说的用意即是要将其《日知录》与时人习见的类书区隔开来。面对明人的学问，清初士人既是挑战者，又是继承人。这意味着对理学之外的儒家学问而言，从晚明到清中期是一个未曾中断过的连续体，在学问的内容与理念上，清初与晚明靠得更近，与乾嘉则离得更远。这进一步提示了一个可能的事实：在明清学术史的进程中，真正重要的转变是发生在清代中期，而并不是我们此前更为重视的明清之际。

[关键词]　类书　晚明清初　顾炎武　《胡贸棺记》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6）－01－0052－016

清代乾嘉时期的江藩在他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里说，“有明三百年”，士人一面埋首八股文，“以讲章为经学”，一面则争相“以类书为博闻”。[①] 所谓“以类书为博闻”，既是明朝学问世界的一个实录，[②] 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明显的轻视意味。明人以类书为其学问的主要表现方式，可是在清人这里，“以类书为博闻”却成了上不了台面的事情。这之间的移形换步涉及学术史、思想史、书籍史和阅读史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无疑会在这些不同方面留下它的痕迹。本文的主旨就是要去追寻这些痕迹，并由此反过来让我们对晚明清初学术移形换步的过程获得更加细腻的理解。

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需要对本文所谓“类书”（以及“类书学”）作一界定。迄今为止，针对类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涵边界，按最一般的看法，类书是分门别类的资料汇编，这些资料可以从之前任何部类的典籍抄录而来，可以抄录整部、整篇，也可以仅摘录某段、某句乃至某字。如果将这种形式的类书称作“正宗类书”的话，那么在晚明清初的语境里，“类书”的范围要比正宗类书宽泛得多。胡道静就提及：

[收稿日期]　2025−06−10

[作者简介]　张循（1978—　），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zhangshizhai@163.com

① 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卷 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5 页。

② 参见艾尔曼：《收集与分类：明代汇编与类书》，《学术月刊》2009 年第 5 期。

> 明末祁承㸁的《澹生堂藏书目》，类家类分三属，为“会辑”“纂略”及“丛笔”。会辑为一般的正宗类书，纂略为《事类赋》《小学绀珠》等。其第三属“丛笔”，是把一些考证性的笔记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都作为类书收进去。①

这里的《事类赋》《小学绀珠》，与所谓正宗类书在形式上区别不大，因此祁承㸁说的类书大体由两部分组成，即“正宗类书”和“考证性笔记”。把“考证性笔记”视为类书并不是祁承㸁的特殊处理，因为这在明人笔下相当常见。例如李维桢给俞安期的《唐类函》作序时就说：

> 著书莫难于类书……是以词人才子名溢缥囊、飞文染翰、卷盈缃帙，而于类书率谦让未遑。近代饶为之者，无如新都（杨慎）、弇山（王世贞）。杨杂纂近百种，王自《卮言》《宛委余编》外，终不敢继欧（阳询）、虞（世南）、徐（坚）、白（居易）而成一大统类。②

杨慎和王世贞在明中叶皆以博学多识震烁一时，他们的《丹铅总录》《艺苑卮言》《宛委余编》等各种“杂纂”，在李维桢笔下都是不折不扣的类书。③

时人类书所含括者还不止于此，今人所说的史料笔记乃至笔记小说等也都可以被视作类书。例如弘治朝的黄瑜在其《双槐岁钞》的“自序”中说，“昔者成式《杂俎》，志怪过于《齐谐》，宗仪《辍耕》，纪事奢于《白帖》”，言下颇有不满之意，故谓“今予此书”中凡“语及古今事变”，“必证以陈编确论”，“必质以广座端人”，以期达到“于道庶几弗畔”的结果。④ 按照今天的分类，他提及的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是很有名的正宗类书，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志怪小说，至于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和他自己的《双槐岁钞》则属于史料笔记。他把这些书并列在一起来表述其著书之志，说明这些书在他眼中都是一家眷属。万历时候的范允临在给夏树芳的类书《词林海错》作序时，以为“诸家类说”如《玉海》《海录碎事》皆未尽善，《韵府群玉》《锦绣万花谷》等更不足数，“庶几《酉阳杂俎》，或可荐之几筵”，却又不免“怪怪奇奇”之病，故不得不慨叹“盖类书之难若此”。⑤ 这就更是将《酉阳杂俎》这种书视作类书的显例了。因此总的来看，晚明清初人所说的“类书”，不仅指正宗类书，还往往含括了所谓说部之书。⑥ 本文所谓的“类书”及其背后的“类书学”，所指涉的对象与范围即是如此。

一、清初学问世界里类书的影子

在明代士人那里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类书（学）”，直到清初仍然像影子一样隐显于学问世界的广阔背景之中。一个最直观的现象是，清初士人仍然像明朝人那样，常以编辑一部类书为自己的学术抱负。孔尚任在作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在园杂志序》中列举了周亮工《书影》等六七部“近代谈部说家”，然后表示：“予欲汇成《稗海》，为万年太平、头白汗青之助，

---

①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3 页。

② 李维桢：《叙》，俞安期：《唐类函》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207 册，齐鲁书社，1995 年，第 6 页。

③ 万历间的郑若庸编有《类隽》一书，是一部分类收集古文隽言的正宗类书。王用桢在跋此书时，也是将之与杨慎的《丹铅总录》《艺林伐山》《谭苑醍醐》等“考证性笔记”相提并论。见郑若庸：《类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95 册，齐鲁书社，1995 年，第 341–342 页。

④ 黄瑜：《双槐岁钞》，中华书局，1999 年，卷首第 5 页。

⑤ 范允临：《序》，夏树芳：《词林海错》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4 辑第 30 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15 页。

⑥ 明人看待“类书”时采取如此宽泛的眼光，主要的原因盖在于类书与说部之间事类相近，不易区分。清初蔡寅斗序袁栋之《书隐丛说》即谓：“考前史《艺文志》，凡分类之札记，概名曰说部。”而“分类之札记”显然也可以说是类书的特征。因此，在说部之书可以被视作类书的同时，类书也可以被称为说部之书。同样是序袁栋的《书隐丛说》，沈德潜谓：“说部之书，昉于宋临川王《世说新语》，后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初学记》、白居易《六帖》继之，而宋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书林韵海》诸书，部序类居，尤称一代大观。”他这里列举的“说部之书”，除《世说新语》外都是所谓正宗类书。袁栋：《书隐丛说》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 113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01 页、399 页。

但削牍浩繁，疲精费日，久萦于怀，亦非细事矣。”[①] 其实他对《稗海》并非仅仅“萦于怀”，而是有所动作的。陈履端（康熙间诸生）即谓：

> 尝考唐时虞世南钞经史百家之书，曰《北堂书钞》。白乐天取凡书精语，各以门目类粹，名为《六帖》。《后六帖》者，宋知抚州孔传所纂，以续乐天之后……乙未（康熙五十四年）春，孔东塘先生从曲阜来淮……自言亦有《稗海》汇辑，卷帙浩繁，渐次成书，如孔传所纂。[②]

“渐次成书”四字表明，《稗海》已经在汇辑的过程中了，唯最后没有成书，故具体情形无从知晓。更重要的是，陈履端以之为《北堂书钞》和白、孔《六帖》的后继者，可见直到康熙末，正宗类书和说部笔记仍然常被视为一家眷属。与孔尚任大致同时的裘君弘的规划更宏大，他说：

> 愚尝病明朝一代事类，尚无全书，欲搜考三百年大小典故及各家杂记，为《明事类纂》一书，以附唐宋诸类书之后。将来若成，或亦足备好古博览者之一助云。[③]

只可惜“将来若成”并未实现。不过从他“附唐宋诸类书之后”的期许看，他是比孔尚任更有意识地在继承类书学的悠久传统。有此志而未成的还有周亮工，他曾提到，“《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皆取落脚字为类”，而他“欲为一书，皆取起头字，依韵编为一书，而取事之稍僻、《韵府》不载者，以便检阅”。[④] 可知他是想作一部依韵成编的类书，目的在于补《韵府群玉》之不备。其他的例子尚多，不必遍举。

在这众多类书编纂计划里面，钱谦益的计划是颇值玩味的。他在给朱虚的类书《古今疏》作序时说：

> 近世俗儒，纽其所习，蔽所希闻，以综核为疏，参稽为拙，矜其固陋，而訾怪旧执，如此者何可胜道。然博物洽闻之士，往往支离烦碎，傅会承讹，则恒为世诟病。[⑤]

前面的“近世俗儒”指的是理学末流之徒，“矜其固陋”云云即指他们空虚不读书。后面的“博物洽闻之士”闻见虽多，但呈现出的面貌却往往是“支离烦碎”，是另一种弊病，这正是“以类书为博闻”的结果。晚明的刘凤就是这种“博物洽闻之士”：

> 凤嗜古博览，苦心钩索，著骚、赋、诗、古文词数十万言，及他纂辑共数百卷。见者惊其浩博，名满一时。然其为文，率饾饤堆积，晦昧诘屈，至不可句，通人弗谓善也。[⑥]

刘凤的《杂俎》即被四库馆臣置于《存目》“类书类”，认为“是编皆摘录古书字句以备剽剟，或注出典，或不注出典，亦漫无义例，不免为饾饤之学”。[⑦] 这种批评其实就是钱谦益所“诟病”的问题。可是针对这一问题，钱谦益的应对方式仍旧是编一部更“好”的类书。所以他称赞朱虚的《古今疏》“诚后学嘉惠之津梁”，更为自己类书编纂夙愿的落空憾恨不已：

> 仆家藏书数万卷，集录前代金石遗文千余卷。仆尝欲贯串焉，汇为一编，而仕途多踬，促促无休。会绛云楼焚，祸同秦灰，凡赐书秘笈，无尠存者。且仆今老矣，乏贯串之力，而书又缺不具，一念之至，引为深恨。[⑧]

从这个不免有些讽刺的结果可以感受到时人在类书学中濡染之深。这种濡染似乎是在无知无觉

---

① 孔尚任：《序》，刘廷玑：《在园杂志》，中华书局，2005 年，卷首第 1 页。
② 陈端履：《跋》，刘廷玑：《在园杂志》，第 186–187 页。
③ 裘君弘：《妙贯堂余谭》卷 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15 册，齐鲁书社，1995 年，第 484 页。
④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 7，朱天曙编校：《周亮工全集》第 4 册，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582 页。
⑤ 钱谦益：《序》，朱虚：《古今疏》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228 册，齐鲁书社，1995 年，第 202 页。这篇署名“年通家弟虞山蒙叟钱谦益”的序文不见于今传钱氏文集。晚明清初坊间书贾刻书的确常有伪托名人序跋或参订以增销路之事，唯考虑到《古今疏》作者朱虚顺治四年进士及第，自刻其所作，与一般书贾刻畅销书之事不可同日语，且是书刻成于顺治间，其时钱谦益犹在世，故此“序”基本不可能出于伪托，当是一篇钱氏的佚文。
⑥ 万斯同：《明史》卷 385《文苑三》，《续修四库全书》第 33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82 页。
⑦ 刘凤：《杂俎》卷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82 册，齐鲁书社，1995 年，第 958 页。
⑧ 钱谦益：《序》，朱虚：《古今疏》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228 册，第 203 页。

的情况下发生并起作用的，颇有一点所谓“惯习”和“缄默知识”的意味[①]——当钱谦益在意识的层面认识到类书式的学问必须改变的时候，那个已经成为他的“缄默知识”的类书学的“惯习”，又悄无声息地把他带回了他最熟悉的舒适区之中。

被视为清学开山大师之一的黄宗羲并没有任何造作类书的打算，但是他的身后依然拖着类书的影子，而且影子距离他是那样近，就在他的开创性著作《明儒学案》的背后便能看到。按《明儒学案发凡》：

> 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②]

《发凡》的这段话同其他各条相比，不仅篇幅略短，而且似乎也无甚精思妙语。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段话可能确实无可多言，但是如果从学术史的立场看，这段话则含有重要信息。

黄宗羲在这里明白表述了自己的撰述方法，即所谓“纂要钩玄”，也可谓之抄录。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治学与撰述方法。张舜徽就指出，“昔人治学缜密，于群书莫不提要钩玄，从事撮钞”，[③]又谓“昔之读诸子百家书者，每喜撮录善言，别钞成帙……遂为治学一大法门”。[④]黄宗羲的“纂要钩玄”当然可以说是对这种方法的发扬光大，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读书摘要”的抄录之作其实无异于一种类书。按《四库全书总目》“史钞类叙”云：

> 《隋志》杂史类中有《史要》十卷，注：“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

像这样对史书的分类摘抄，放在明朝人的概念里就是类书。“史钞类叙”又谓：“沿及宋代……《通鉴总类》之类，则离析而编纂之。”[⑤]《通鉴总类》自然就是“史钞”之作，《四库提要》谓该书：

> 取司马光《资治通鉴》事迹，仿《册府元龟》之例，分为二百七十一门，每门各以事标题，略依时代前后为次。[⑥]

可见这类抄录之作与类书几乎没有区别。“史钞类叙”又以为，这些“史钞”之作泛滥之后，不免“趋简易，利剽窃”之弊，然要其本始，则固可谓“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即韩愈所称记事提要之义”。[⑦]韩愈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史钞”，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类书。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类家”小序在介绍类书功用之后即谓：“韩愈氏所称钩玄提要者，其谓斯乎。”[⑧]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史钞”与“类书”都没有根本的区别，[⑨]张舜徽于是干脆说：“窃意宜立书钞一门，附于类书之末，以统录古今撮抄之编。”[⑩]有了这层学术史的背景我们就可以确知，在黄宗羲的时代，分类抄录之书事实上就如同类书。黄宗羲以“纂要钩玄”这种类书的方式来构建他的《明儒学案》，正是不自觉中濡染于类书惯习的结果。在这个学术史的层面上，他与他批评的那些“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的“钞先儒语录者”并无区别，不过他最后那个“未尝袭前人

---

①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 年；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徐陶、许泽民译，陈维政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本）》，中华书局，2008 年，卷首第 14 页。

③ 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66 页。

④ 张舜徽：《广校雠略 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77 页。

⑤ 两段引文皆见《四库全书总目》卷 65，中华书局，1965 年，第 577 页。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 65，第 578 页。

⑦《四库全书总目》卷 65，第 577 页。

⑧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 4 下，《续修四库全书》第 91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92 页下。

⑨ 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其实也是一种“史钞”，因此也不妨视为类书。张赟冰已经指出，南宋袁枢创作《通鉴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的开山之作——基本上就是用的类书的方法，而且南宋人也都是把它当作一部类书来看的。参见氏著《纪事本末体源流新论》，《文献》2023 年第 2 期。

⑩ 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第 66 页。

之旧本”的郑重承诺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必须努力跳出所谓辗转稗贩的类书窠臼，因此，虽然同为“钞先儒语录”，但最终呈现出的水准毕竟相隔悬远了。

把《明儒学案》与类书联系起来还有更直接的证据。与黄宗羲基本同时的陈允衡《复朱遂初先生书》说：

> 不肖鄙意，妄拟专取明事，成《类略》一书，以人才为主，以事实分类……如治兵治河之人，即采其生平论兵论河之切要者，载之传后；文章理学之人，即采其生平论文论学之切要者，载之传后。皆以小字夹行附见，微踵《事文类聚》之意。①

从“以事实分类”和“微踵《事文类聚》之意”可知，陈允衡计划中的《类略》是一部很典型的类书。再从“文章理学之人，即采其生平论文论学之切要者，载之传后”来看，这部书的体例结构——人物小传+论学要语——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几乎一模一样，若单拎出其中“理学之人”的部分，则不妨就是另一部“明儒学案”。既然陈允衡把他的“明儒学案”根本上就视为一部类书，那么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又何尝不可以是当时人理解中的一部类书呢？

张涤华曾提醒说，“有一事为治类书者所当知，即世行旧籍中，往往有非类书而可作类书观者”，“其体制虽与类书有殊，而前人所以利用之者，则与类书无别”：

> 字书如《尔雅》《说文》《广韵》之类，其注旁罗曲载，靡所不该，足以广异闻，资多识，而古今精字善句，亦汇聚焉。文章采色本之于此，则词句斑璘，根底深厚（汉赋即如此），取径尤高于比类之家剿袭字句者一等，故文家亦时时取阅，盖即以之作类书之用。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眼界可以由此而开阔很多。例如我们对清初大儒颜元的一段往事就可以获得更确切的理解。

康熙七年，颜元因养祖母去世，需要确定自己服丧时的进食原则，因此他写信询问朋友王法乾说：

> 《丧大记》云：“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字汇》解“溢，二十两，可当今六合”，元两日亦不胜此。今定为三日一溢米，犹每食不能尽。盖古人身大食多，日二溢，言极少也。今或改之，得中乎？③

他的意思是，根据《礼记·丧大记》的要求，服丧之人应该一日两餐，即朝食一溢米、夕食一溢米。但是一溢的分量太大，他只好变通“定为三日一溢米”。后来他说自己的实际情况是，每天朝食之后，挨过一整天到了暮时，往往又遇哀伤之情涌起，没法再进食。因此他在那段时间几乎无所饮食，导致深受其害，病弱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事实上，颜元之所以深受其害，直接的原因是他漏掉了《丧大记》里关键的四个字。《丧大记》的完整文字是：“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无算。”④“食之无算”是说可以看情况随时进食，这是考虑到孝子于丧中哀痛，难以像平日一样有规律地进食，只要控制一天进食的总量不超过二溢米即可。由于颜元遗漏了这一句，所以他完全没有搞清楚朝、夕一溢米的确切意思，以致发出“定为三日一溢米”及“古人身大食多”之类的冬烘言论，最终还弄得自己深受其害。

颜元因为反对读书静坐之学而在清初震动一时，因此以往的研究认为，颜元对《丧大记》的误读是出于他对读书这件事的强烈反感，故而不愿意埋头仔细阅读经典。⑤但现在当我们了解到清初的类书（学）背景之后，整个解释就需要调整了——颜元之所以不读《礼记·丧大记》，

---

① 周亮工：《尺牍新钞》卷 11，朱天曙编校：《周亮工全集》第 9 册，第 819–820 页。

② 张涤华：《类书流别（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23 页。

③ 颜元：《习斋先生记余遗著》，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 年，第 594 页。

④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礼记正义》卷 4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258 页。

⑤ 参见张循：《“颜元”的诞生——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重建与诠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读书，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习惯了读书，只不过他习惯读的是类书而已。梅膺祚的《字汇》就是被他当作类书来使用的。按《字汇》已集水部解“溢”字云：

> 溢……满溢也。又二十两曰溢，《丧大记》：“朝一溢米，莫一溢米。”①

颜元给王法乾的信中，在《丧大记》之后即言及《字汇》，且其引用的《丧大记》文字与《字汇》中所见者一般无二——《字汇》由于是专解“溢”字，故删掉了“食之无算”四字，于是颜元的引文中同样就没有这四个字。所以颜元信中的《丧大记》云云，基本可以肯定就是从《字汇》转手而来的。在丧中行礼的关键时刻，颜元选择翻检《字汇》而不是读《礼记》原书，其实就是他身上类书学的惯习使然。

《字汇》和作为其修订本的《正字通》可以当作类书来用，因此在明清之际拥有大量读者。②直到乾隆元年被保举博学鸿词科的徐文靖，他作有一部考证性的《管城硕记》，后来四库馆臣的《提要》评价道：

> 读史引证，乃及于潘荣之《(通鉴)总论》、刘定之之《十科策略》、蔡方炳之《广治平略》、廖文英之《正字通》、阴时夫之《韵府群玉》，斯皆未免汩于俗学。然其推原《诗》《礼》诸经之论，旁及子史说部，语必求当，亦可谓博而勤矣。③

从后半截评语看，徐氏之学称得上颇有水准，故被荐举应鸿博科。但即便他这样的鸿博之士，像《正字通》《韵府群玉》这些类书仍然是其学问世界里的重要内容。《管城硕记》共 30 卷，其中有 4 卷即专论《正字通》，还不是《提要》所说“引证”及之而已。康熙三十八年华希闵自序其类书《广事类赋》云：“今天子重鸿博之选，士乐以词赋自见，是书或亦鼓吹之少助也。”④此处的“鸿博之选”是指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据此言可以知道，鸿博科讲究的学问与类书的关系非常密切，然则同样作为“鸿博之选”的徐文靖所展现的，正是这种学问传统的流风余韵。⑤不妨对比一下康熙十八年和乾隆元年的两次博学鸿词科，以及乾隆四十年前后的四库全书馆。对这三者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解读，但无论如何，它们无疑是对当时认知中的“博学之士”的三次遴选。康熙十八年中式的五十人和乾隆元年中式的十九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以诗文词章见长，经史考证方面则并没有很高的成就，词章之学也是两次鸿博科考试的基本取向。⑥乾隆后期的四库全书馆就明显不同了。梁启超说得很直白：“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⑦这三次人才遴选，其实也就反映了这三个时间点上针对“学问”的标准及内涵的认识。可以说直到乾隆朝之初，时人对“学问”的认知在整体上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明代那种类书之学在“学问”世界里仍然占有显著的分量。徐文靖在乾隆元年可谓“鸿博”，几十年后则不免“俗学”之讥，其转变的背景即在于此。

---

① 梅膺祚：《字汇》，《续修四库全书》第 23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58 页。

② 关于《字汇》与《正字通》之间的关系，参见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27–135 页。朱彝尊的两段文字很能说明当时这类字书的流行：“字学之不讲久矣。举凡《说文》《玉篇》《佩觿》《类篇》诸书，俱束之高阁。习举子业者，专以梅氏之《字汇》、张氏之《正字通》，奉为兔园册。”“小学之不讲，俗书繁兴，三家村夫子，挟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以为兔园册，问奇字者归焉，可为齿冷目张也。”分别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 34《字鉴序》、卷 43《汗简跋》，世界书局，1989 年，第 430、524 页。

③ 徐文靖：《管城硕记》，中华书局，1998 年，第 575 页。

④ 华希闵：《广事类赋》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 124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80 页。

⑤ 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评论《管城硕记》谓：“如《正字通》之类，本无人尊奉之者，何劳词费，而辄与古书并加指摘，何其不惮烦耶。”这是典型的乾嘉之后的见解，与乾隆初以前的学术世界已经颇为隔膜了。引文见徐文靖：《管城硕记》，第 576 页。

⑥ 参见胡琦：《己未词科与清初“文”“学”之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罗吉芝：《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研究：史料、史实与学术》，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 年，第 127–145 页。

⑦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编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15 页。

二、顾炎武“采山之铜”说发微

柴德赓的《清代学术史讲义》论及顾炎武说：“顾氏之《日知录》，不用分类应有尽有之法，而只书心得见解，最难，非博不可、非精不可，又须有思想。”[①] 这两句话看似无甚精彩，实则含义殊深——所谓“分类应有尽有之法”，即指顾炎武的时代所流行的“类书”之法；其言下之意是，顾炎武是在有意识地突破类书学的传统，其《日知录》是对并世类书的超越，而同时仍与类书有牵扯不断的联系。这提示了一个以往讨论顾炎武时很少被留意到的视角。接下来我们就从顾炎武自己的一段文字入手，去观察他与他身后类书学背景的关联。

按今本《日知录集释》卷首附有一篇顾炎武的《与人书十》，凡讨论顾氏之学者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在书中谈及《日知录》的写作情况，并回应了对方的咨询：

>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②]

既有研究在解读这段文字时，基本上着眼于强调原始材料与原创性的治学方法或治学精神的层面。[③] 这当然是题中固有之义（如强调原始材料），或者也不失为一种现代诠释（如强调原创性）。但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这段话并不是顾炎武对自己学术观点的正面阐述，他的话是有明显针对性的，必须了解他发言针对之所在，才可能对他言中表出或未表出的全部用意获得确切的把握。

细勘这段文字不难发现，顾炎武之言处处是针对着当时的类书学背景而发的。无论哪种形式的类书，都是广采既有之群书而成，这就是“买旧钱”“以充铸”的基本含义，也就是所谓辗转稗贩，而其结果则是“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亦即斥责类书学问时常常提及的饾饤琐碎。至于开头的“纂辑之书”也不是泛泛而言，钱穆注意到：

> 所谓《日知录》成书方法者，其最显著之面目，厥为纂辑。亭林尝自述先祖之教，以为“著书不如钞书”……至于《日知录》尤为钞书工夫之至精细者。[④]

因此“纂辑之书”其实就是“钞书”而成者。前文说过，“钞书”之作在当时人语境中就是一种类书，然则顾氏“今人纂辑之书”云云，指的就是当时人编纂类书的情形。虽然同样免不了“钞书”（都需要“铜”），但顾炎武的“采铜于山”经历了一个从矿石到铜钱的“勘探”和“冶炼”过程，[⑤] 与直接取用“废铜”全然不同，最后铸造出来的“钱”，其质量的“精细”与“粗恶”当然有冰炭之别了。

但是解读及此并不能穷尽问题。顾炎武说，“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的结果是这些古人之宝“不存于后”。如果从一般的类书编纂过程上讲，这句话是说不通的——从各种既存典籍中搜采了材料怎么就会导致这些典籍“不存于后”了呢？若果如此，则明人类书编纂风潮的结果就应该是既有典籍的大规模散佚，可是这与我们看到的事实明显不符。那么所谓“不存于后”应当如何理解呢？“今人纂辑之书”是发生在顾炎武眼前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的

---

① 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65 页。

②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校注：《日知录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卷首第 15–16 页。

③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161 页；许苏民：《顾炎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5–46 页；吴怀祺：《“采铜于山”与学术原创性思维》，《安徽史学》2007 年第 6 期。

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59–160 页。

⑤ 参见许苏民：《顾炎武评传》，第 45–46 页。

观察有误，因此一定是其言中有什么信息被我们忽略或误解了，只有把这些信息钩稽出来并联系起来，才能尽得他这段话的底蕴。

关键就在“舂剉碎散”四个字。简单地说，这四个字不仅是对类书造成的知识碎片化的一种修辞性描述，同时也是对部分类书纂辑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环节的写实性描述。为说明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转而进入一篇在书籍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文章。按明中叶的唐顺之作有一篇《胡贸棺记》，记载了一个名叫胡贸的书佣，其工作深受唐顺之的欣赏甚至倚重，唐氏还很周到地为胡贸提前准备好了身后要用的棺材，《胡贸棺记》即为此而作。其文略云：

> 书佣胡贸，龙游人。父兄故书贾。贸少乏资不能贾，而以善锥书往来诸书肆及士人家。
>
> 余不自揆，尝取《左氏》、历代诸史，及诸大家文字，所谓汗牛塞栋者，稍删次之以从简约。既披阅点窜竟，则以付贸使裁焉。始或篇而离之，或句而离之，甚者或字而离之，其既也，篇而联之，句而联之，又字而联之。或联而复离，离而复联，错综经纬，要于各归其类而止。盖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书佣往往束手，虽士人细心读书者，亦多不能为此。贸于文义不甚解晓，而独能为此，盖其天窍使然……余所以编书之意远矣，非贸则予事无与成，然贸非予，则其精技亦无所用。
>
> ……予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不复一有所披阅点窜，贸虽尚以佣书糊口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虚闲而无所用……然则贸之硉硉勤苦，从事于割截离合，而一付之无何有之乡也，与一醉亦无以异也，其亦何憾之有。①

此文又为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和徐复祚的《三家村老委谈》等说部书收录，故得见者匪鲜。

书籍史研究者针对这段材料已经有过反复解读。周启荣据之认为，胡贸是唐顺之雇用的“独立刻工”之一，同时他也“受雇于不同的出版商”。这表明他是将文中的“锥书”理解为刻书（字）。至于胡贸的“精技”则是：

> 胡在文字的版面设计（与欧洲书籍的书页排字设计相仿）方面极有天赋，唐十分赞赏胡在编辑和编排书页格式（断句或并句以及段落章节的划分）方面的才华。的确，各种空间的设计是手稿转为印版稿的一个重要问题。②

也就是说为唐顺之所欣赏乃至依赖的胡贸的“精技”，主要是指胡贸在书籍刻印之前所做的版面设计。但这个解释面临很大的困难：无论是将“锥书”解释为刻书，还是将“篇而离之，句而离之，字而离之”以及“篇而联之，句而联之，字而联之”理解为“断句或并句以及段落章节划分”，即所谓“版面设计”，都没有任何确凿的文献证据；同时从现存唐顺之编纂的书籍的面貌，也看不出其中的“版面设计”展现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天赋”。由于“龙游人以参与图书生产和贸易而著称”，③ 因此周启荣很可能是将这个一般性的印象投射到胡贸这个龙游人身上去了。

其后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也看到了这篇文字的价值，认为此文记载了一位“从事书籍生产的工匠的经历”，是反映当时书籍“刻工生活和境况的最深入的材料”。④ 他称胡贸为“刻工”，大概是受到了上述周启荣的影响，但他的具体解读与前者相差很大：

> （胡贸）校订和装订书籍的技术，尤其是将大量印出来的书页排列顺序并用一把锋利的锥子在书页上钻眼的本事，令当时许多书业人士吃惊，其重要原因是他的工作速度和质量并不因他无法领会文字的意义而受到影响。开始，他的天赋为他在书店和文人学者家里赢得了许多工作，

---

① 唐顺之：《胡贸棺记》，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560–562 页。

② 周启荣：《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 世纪》，张志强等译，夏维中等校，商务印书馆，2023 年，第 96 页。此书英文原版出版于 2004 年。

③ 周启荣：《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 世纪》，第 178–179 页。

④ 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3 页。此书英文原版出版于 2006 年。

> 二者都经常刊印书籍……后来，他在许多学者家中谋生，但他装书的技术渐渐失去用处。①

这个解读在不久之后受到了艾俊川的批评，被认为与唐顺之的原文之间存在很大的出入。艾俊川指出，周绍明解读中的“装订书籍的技术”及“用一把锋利的锥子在书页上钻眼”等关键语句，在原文中“一处也找不出来，因为唐顺之根本没写这些事”。② 他对胡贸的工作予以了新解释：

> 胡贸不是一位装订工人，也不做装订工作。作为“书佣”，即以书写技能谋生的人，他善于誊写，并精通另一项技艺：为学者编书做底稿整理工作，就是《胡贸棺记》最后说的“硉硉勤苦，从事于割截离合”。唐顺之选编古文，“取《左氏》、历代诸史，及诸大家文字所谓汗牛塞栋者，稍删次之以从简约”，先在底本上“披阅点窜”，完成评选工作，然后把书交给胡贸，请他把不需要的部分剪裁掉，把需要保留的部分连缀编排起来，缮成新书的清稿，其实就是现在说的“剪刀＋糨糊”的编辑活儿。③

总之，“‘善锥书’应为‘善书写’”，这就是胡贸“运用‘锥书’技能所做的工作”。④ 艾俊川的这段解读要分开来看：他认为胡贸的工作由两种技艺组成，一是“从事于割截离合”的书稿编辑工作，这的确接近了唐顺之的原意；至于说胡贸的另一项技能，“善于誊写”和“缮成新书的清稿”，以及最后的中心观点：“‘善锥书’应为‘善书写’”，则与原文不符，基本不可能成立。

首先，“善于誊写”和“缮成新书的清稿”云云只是一种想象，这样说的理由就是艾氏自己的话，“因为唐顺之根本没写这些事”。唐顺之称胡贸为“书佣”，这是艾氏推想的出发点——“作为‘书佣’，即以书写技能谋生的人”。古人笔下的“书佣”常见的工作的确是替人抄写，但也可以泛指从事与书籍或文书整理相关的工作，因此与“善书写”与否并无必然联系。⑤ 事实上，从唐顺之的原文看，胡贸“善书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一，如果胡贸真的“善于誊写”而且因此还替唐顺之“缮成新书的清稿”，则唐氏在表彰胡贸佣书之功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理由对此只字不提；其二，唐顺之提供的“贸于文义不甚解晓”的信息非常重要，这表明胡贸并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可是对于当时从事誊写、抄写工作的人而言，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与其抄写质量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书籍史研究者所反馈的情况是：

> 抄写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阅读活动，抄写者如果能够具备一定的学识，那么就能够理解文本的内容，从而减少失误。从明代抄本讹误的情况来看，很多案例都是由抄写者无法理解文本的内容而产生的。⑥

因此反过来，“于文义不甚解晓”的胡贸却能以“善于誊写”“善书写”而备受称赞，其本身就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其次，唐顺之文中有一个重要信息被周、艾二氏共同忽略了，那就是胡贸在唐顺之处从事的“割截离合”的工作与其在他处——开始的“往来诸书肆及士人家”和后来“尚以佣书糊口诸士人家”——所从事的“锥书”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在周启荣的解读里似乎有所体现，可惜颇为含混模糊）。对此唐顺之一再明白表出、毫无疑义，其一则曰“非贸则予事无与

---

① 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第 34 页。

② 艾俊川：《“锥书”杂谈》，氏著：《中国印刷史新论》，中华书局，2022 年，第 298 页。

③ 艾俊川：《“锥书”杂谈》，氏著：《中国印刷史新论》，第 298–299 页。

④ 艾俊川：《“锥书”杂谈》，氏著：《中国印刷史新论》，第 299 页。

⑤ 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转录唐顺之《胡贸棺记》之前写道：“王弇州书室中一老仆，能解公意。公欲取某书，某卷、某叶、某字，一脱声，即检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陈抱冲禹谟，为助教，其书满家，亦有一仆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即仆隶，天亦饶之。荆川先生有书佣胡贸，作《胡贸棺记》。”朱氏这里提及的王、陈二人家里的两个书佣，其工作显然就不在于抄书，而是为士人提供其他读书、著书之助。他将胡贸与这两个书佣并列，可知他对胡贸这个书佣工作性质的理解也是如此。朱国桢：《涌幢小品》卷 20《书仆书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415 页。

⑥ 刘勇：《明代抄本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 年，第 119 页。

成，然贸非予，则其精技亦无所用”，再则曰“贸虽尚以佣书糊口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虚闲而无所用”。这清楚地表明，胡贸只有在唐顺之那里才会发挥其“割截离合”之“精技”，因此他在其他书肆或士人家借以吃饭的“善锥书”的本事就肯定是与此不同的另一套工夫。至于这个“善锥书”究竟何指，唐氏文中没有说明，故无从确知。不过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基本可以确定不是指“善书写”。若本着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的原则，把“善锥书”仍旧解为“善于装订”，恐怕更为合适一些。[①] 毕竟当一个书佣并不“善书写”，也不代劳“剪刀 + 糨糊”的工作时，他还能做什么与书相关的事情呢？总之，“锥书”与“割截离合”是胡贸在不同的地方分别从事的性质不同的工作，周绍明把“割截离合”之事当成了“锥书”装订，艾俊川又反过来认为“锥书”不是装订而是“割截离合”的编辑活儿，[②] 都是没有意识到二者本非一事，故不免自生纠葛，辨所不必辨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更重要的解读环节。前面说过，艾俊川指出胡贸在唐顺之那里做的是“割截离合”的编辑工作，的确接近唐顺之的原意。其所以只能说“接近”，是因为其中仍有关键性的误解。前引艾氏之言谓：“唐顺之编选古文，‘取《左氏》、历代诸史，及诸大家文字所谓汗牛塞栋者，稍删次之以从简约’，先在底本上‘披阅点窜’，完成评选工作，然后把书交给胡贸，请他把不需要的部分剪裁掉，把需要保留的部分连缀编排起来，缮成新书的清稿。”那么唐、胡二人的编书工作就应该是如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唐顺之从若干书籍中挑选出需要的篇章，形成一个“底本”（艾氏对这个“底本”的表述非常模糊，它是唐顺之抄录形成的吗？还是以其他什么方式形成的？），然后在此“底本”上“披阅点窜”。

第二步，唐顺之将“披阅点窜”好的“底本”交给胡贸，胡贸再对这个“底本”进行加工，“把不需要的部分剪裁掉，把需要保留的部分连缀编排起来”。

第三步，胡贸依据经他加工之后的“底本”，“缮成新书的清稿”。

如果我们对于艾氏的文字没有误读的话，那么必须说，他根据《胡贸棺记》归纳出的唐、胡二人编书的这三个步骤，都不曾在实际中发生过。其中第三步如前文所述，是出于想象，第一与第二步则不免似是而非，因为胡贸的确进行了剪裁粘贴的工作，但是他剪裁粘贴的对象并不是所谓唐顺之交给他的“底本”，[③] 而是唐氏书房里“《左氏》、历代诸史，及诸大家文字”这些典籍的原书。下面让我们根据文献证据的指引来澄清这一事实。

唐顺之名下经由胡贸剪裁之功而成的书有哪些，其实可以部分考证出来。唐顺之的《历代史纂左编》由胡宗宪初刊于嘉靖四十年（1561），亦即唐氏去世的次年。此书卷首有王畿所作《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一首，其中有云：

> 嗟乎，书契之不能还于结绳，书契又繁而不能还于简也，时之趋也。荆川子是编，盖求其简而不可得，而意则远矣。[④]

而唐顺之的《胡贸棺记》中有一段文字是：

---

① 陈腾也认为将“善锥书”解为“善书写”不妥，仍当以传统的“善装订书”的解释为是。他的考虑是：“明嘉靖年间，线装书初兴于苏州地区，如果把‘锥书’的稀见表述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理解，或许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陈腾：《线装书的起源时间》，《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 年第 4 期。

② 艾俊川在另一篇文字里把此看法表述得更简洁：“胡贸运用‘锥书’技能做的工作，就是把唐顺之选好的古文剪裁粘贴，形成书稿。”艾俊川：《线装时代的订书人》，《藏书报》2021 年 11 月 22 日第 10 版。

③ 其实仔细想一想就会有疑问：如果存在一个唐顺之“披阅点窜”的“底本”，而胡贸的目的是“缮成新书的清稿”，那么胡贸直接根据这个“底本”缮成清稿即可，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先剪裁粘贴然后再缮写呢？根据“底本”直接缮写是书籍整理时的常见操作，例子很多。参见刘勇：《明代抄本研究》，第 231 页。

④ 王畿：《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唐顺之辑：《历代史纂左编》卷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第 2a 页。

> 余之于书，不能及古人蚕丝牛毛之万一，而贸所为，则蚕丝牛毛之事也。嗟乎，书契之不能还于结绳，书契又繁而不能还于简也，固也。然余所以编书之意远矣。①

这两段文字，何其相似乃尔！按王畿《凡例》中有“今督府梅林公（胡宗宪）购梓以传于世”②云云，可知他此文作于唐氏卒后胡氏刊印《左编》之际。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王畿的文字是从唐顺之的《胡贸棺记》中照搬过来的。《棺记》“余所以编书之意远矣”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非贸则予事无与成，然贸非予，则其精技亦无所用”一句，然则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历代史纂左编》就是属于唐氏所谓“非贸则予事无与成”的作品，否则就无法解释，王畿给《左编》作凡例，何以要去参考名不见经传的书佣胡贸的事迹呢？而作为唐顺之的同时友人，王畿有渠道得知胡贸其人与《左编》（乃至其他更多作品）纂辑之间的因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接着再看茅坤的《荆川先生稗编序》：

> 荆川中丞公没，予过吊其家，访其遗文，间得公所为《左》《右编》与《文编》《稗编》者之序。已而督府胡公宗宪则梓《左编》。予覆之，盖按春秋战国以来传记而纂之者。然其传记或甲乙相互见，而公则并按名氏而裒系之；或传记所不载，而公复自他书旁采之。况一切出于故本，幅裁句裂，甚且字钉，而非由公手自摹画者，故其书多讹与复，而无次也。③

茅坤这里描述的，是他所见胡氏刊印《左编》时所据的本子呈现出的样态：整个本子（一切）是通过剪裁各种原书（故本）后拼接而成的，所谓“幅裁句裂，甚且字钉”，与《胡贸棺记》中“或篇而离之，或句而离之，甚者或字而离之”云云若合符节。因此基本可以确信，其所见者就是经由胡贸“割截离合”而成的本子（难怪王畿要去翻看《胡贸棺记》了！）。茅坤还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本子并不是唐顺之“手自摹画”出来的，这也意味着，并不存在一个唐顺之“披阅点窜”而成的“底本”，胡贸所剪裁的只可能是各种典籍的原书。至于《右编》《文编》和《稗编》等是否也出自胡贸的剪裁，则书缺有间，未可断言了。

唐顺之把这套“割截离合”的工作称作胡贸的“精技”，但实际上，如此编书的当然不止他们二人。观李维桢《唐类函叙》云：

> 往余取《艺文类聚》《初学记》，割裂而缀缉之，以便省览。时《北堂书钞》无所得，写本白、孔《六帖》财一部，不忍割。④

李维桢这里说的“割裂而缀缉”，就是对《艺文类聚》《初学记》的原书直接剪裁。与此同时，他手里仅有一部写本的“白、孔《六帖》”，于是就舍不得这样干了。李维桢是自己动手裁书还是另有他人代劳，无从确知，但从唐顺之说胡贸的“精技”非其他书佣或士人可办来看，多半还是另有专业人士来替他捉刀的。唐顺之和李维桢都是名满天下的精英士人，他们不约而同地裁书以编书，意味着在他们这样藏书丰富的人那里，剪裁原书的编书手法恐怕不会少见。

这种“割截离合”之法也不是古人的专利，直到现代的类书编纂仍在如此操作。出版史的研究者告诉我们：类书的传统编纂出版方法是由编纂者编定纸质书稿交给出版社，出版社经过审读、编辑加工、排版、校对、印制等环节出版成书。编纂者在编纂书稿时往往采取“剪刀加浆糊”的方法，即编纂者普查资料，广泛阅读，把需收录的内容复印后剪贴成书稿，再进行标点、校勘等工作，最后将编定的纸质书稿交给出版社出版。⑤“复印”就是制造复本，编纂者直接对此复本下“剪刀加浆糊”的工夫，大体就是胡贸等人的工作。但也只能说“大体”，因为胡贸的工作似乎更单纯一些。按王畿《凡例》之末云：

---

① 唐顺之：《胡贸棺记》，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第 560–561 页。

② 王畿：《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唐顺之辑：《历代史纂左编》卷首，第 2b 页。

③ 茅坤：《荆川先生稗编序》，唐顺之辑：《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编》，天津图书馆藏明万历九年刻本，第 1a、1b 页。

④ 李维桢：《叙》，俞安期：《唐类函》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207 册，齐鲁书社，1995 年，第 5 页。

⑤ 龙玉明：《类书的编纂出版方法探析》，《编辑学刊》2012 年第 4 期。

王子世新、左子升甫，博雅好古，荆川子入室同志友也。督府开馆延致，属以校雠之役。编中间有讹舛，与披窜未竟而辞不相比者，二子悉从厘正，始复为完史云。[①]

如前所述，王畿专门参阅过《胡贸棺记》，对胡贸的工作了如指掌，可是在通篇《凡例》中绝无只字言及胡贸，而唯称王、左等士人之有功于此书。[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胡等人编书的大致程序：先由唐顺之在原书上“披阅点窜”，再将这些书一齐交给胡贸进行初级工作，即根据“披阅点窜”的意思来“割截离合”，形成一个本子；而校勘等进一步的高级工作，则由文化水平高得多的士人来完成；至于缮写成上版用的清稿，自然是更后一步的事了。在此过程中，之所以无法根据唐顺之的“披阅点窜”直接誊录缮写，而必须经过胡贸的一道工序，其原因也不难推知。王畿的《凡例》说，《史纂左编》“经二十余祀，凡七易稿而始成编”，[③]唐顺之也说胡贸“为我从事久也”，[④]由此可知唐、胡二人之间的合作长达数十年，大概只有胡贸能够读懂唐顺之在原书上做的那些“甚淆且碎”的“点窜”标记，这是他们经过数十年的不断磨合才逐渐形成的默契，固非他人可以插手。[⑤]唐顺之所谓“非贸则予事无与成，然贸非予，则其精技亦无所用”，其究极之意，即在于此。

经过这番对唐顺之《胡贸棺记》的研究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顾炎武“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之言，其所指为何就很明白了。那就是当时人纂辑类书时直接剪裁原书，导致那些既存书籍在物理意义上被损毁。当然不是所有的类书编纂都会剪裁原书，只不过以这种方式（类似于今日电脑操作中的“剪切 + 粘贴”）纂辑而成的类书，其辗转稗贩、剽窃饾饤等弊病会更严重地呈现出来。顾炎武之所以要拈出这种典型的类书纂辑方式，其用意当然是要将自己的《日知录》与时人习见的类书区隔开来。他的这一区隔的努力也意味着，当时有很多人都是用类书的眼光来看待《日知录》的，《与人书十》背后那个不知名的收信人就是其中之一。[⑥]他询问顾炎武的“《日知录》又成几卷”这个问题，其实也具有鲜明的学术背景。崇祯末冯廷章辑有《菉斐堂子史汇纂》24 卷，其“凡例”有云：

子史两书，灏瀚不可纪极，非研穷攻苦，几易春冬，以至贯穿今古，安能汇成一书，毫无遗憾。兹集也，偶为书林所请，草草采掇，及既然其请，则又刻期竣事，每阅一编，随手摘录，

---

① 王畿：《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唐顺之辑：《历代史纂左编》卷首，第 2b 页。

② 唐顺之《胡贸棺记》之末云：“百余年后，其书或行于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论其故所删次之人，则予之勤因以不没，而贸乃无以自见，是余专贸之功也。余之书此，亦以还功于贸也。”唐顺之：《胡贸棺记》，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第 561 页。这简直是一句谶言。胡贸“无以自见”岂待“百余年后”，在同时代的王畿的手里就已经把他淹没掉了。

③ 王畿：《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唐顺之辑：《历代史纂左编》卷首，第 2a 页。

④ 唐顺之：《胡贸棺记》，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第 561 页。

⑤ 当然也有配合不够默契的例子。阎若璩就提及：“尝闻钱牧翁撰《列朝诗集》，先采诗于白下，从亡友黄俞邰及丁菡生辈借书，每借辄荷数担至。牧翁以人之书也，不著笔，又不用签帖其上，但以指甲掐其欲选者，令小胥钞，胥奉命惟谨，于掐痕侵他幅者亦并钞。牧翁不复省视。”由于是借自他人的书，故钱谦益不施笔墨（更不可能剪裁），惟施指甲痕迹以示意。可是替他摘抄的小胥显然与他没有足够的默契，分不清哪些是钱氏下指之痕迹、哪些则是下指时用力太过以至“侵他幅”之痕迹，于是见有甲痕就抄，结果自然多违钱氏之本意。引文见阎若璩：《潜邱札记》卷 4《初刻唐百家诗选》，中华书局，2023 年，第 301–302 页。

⑥ 康熙间的王棠有《燕在阁知新录》32 卷，《四库提要》谓其“大旨欲仿顾炎武《日知录》，然不过《谈荟》《樵书》之流亚也”。《知新录》的水准当然不能与《日知录》相提并论，但二者在体裁上的确相似。其书“凡例”乃云：“是书非类书也。偶有所得，即书片纸，投之箧中，日久成帙，取事之相近者编于一处，挂一漏万，知所不免，然非分门立户比也。”此书卷首王氏“自序”作于康熙五十六年，则“凡例”亦当作于此前不久。这就意味着直到康熙末，像《知新录》这类学术笔记，其背后的类书的影子仍然没有完全消散。然则顾炎武要着意将其《日知录》从类书的背景中抽离出来，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了。引文见王棠：《燕在阁知新录》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00 册，齐鲁书社，1995 年，第 736、90 页。

即随手促而梓之。[1]

这就是“今人纂辑之书”的一个例子。编者冯氏也知道若真欲“采铜于山”，则非“几易春冬，以至贯穿今古”之后方可期成事，但现实中则往往需要“刻期竣事”，故不免随阅随录随梓，而数十卷书，转盼即成。不仅冯廷章这些一般士人，即便精英学者的纂辑之书也不免于此。四库馆臣论及杨慎的《丹铅总录》时就说，杨慎“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饾饤为编，只成杂学”，[2] 朱国桢说自己的《涌幢小品》也是“入目便记，记辄录出，约略一日内必存数则”。[3] 这些正是“今人纂辑之书”的常态。在这个背景下，收信人问顾炎武别来一载《日知录》又成“几卷”，其实是出于当时人的正常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颇严谨的态度，因为在那时，“一载”才“几卷”的分量实在是属于很保守的估计了。

顾炎武《与颜修来手札》说：

弟向日录有《古今集论》五十卷，顷究李、刘年翁延弟至署，删取其切于经学治术之要者，付诸梓人，名曰《近儒名论甲集》。因此淹留，尚有旬月。如贵地友人家有邺架之藏，欲一就观，且得以晤言讲习，尤幸事也。日下欲借唐荆川《稗编》第一套钞录几首，未知可转觅否？[4]

唐顺之纂辑的《稗编》共120卷，其中前42卷的内容都是历代名儒有关六经的论议文字，这与顾炎武删取“切于经学治术之要者”以为《近儒名论甲集》的主旨完全相符。可知顾炎武是因为要编纂《近儒名论甲集》，所以“欲借唐荆川《稗编》第一套钞录几首”。从这里可见，当顾炎武要从事与“今人纂辑之书”类似的工作时，就不得不掇拾于唐顺之的《稗编》这类其他的“今人纂辑之书”了——这正是所谓辗转稗贩。

可以说，顾炎武是在同时从事“采铜于山”和“辗转稗贩”两手工作，这其实是此前固有的传统，因为类似情形在晚明的学术世界里很常见。例如万历间的焦竑，也有《焦氏类林》与《焦氏笔乘》所代表的两手工作。据李登的《刻焦氏类林引》说，焦竑读书凡遇“当赏会与夫自有所见欲以阐幽正词者，辄手裂赫蹏细书而贮之……最后除自言者别为《笔乘》，其第辑录备览观者，特付愚诠次”。[5] 因此《笔乘》和《类林》是焦竑的两类读书笔记，前者可谓自言其所见的学术笔记，后者则“主采辑，非自发其所蕴”。[6] 这里虽有将学术笔记单独拎出以示区别的意味，但在价值上则并无轩轾，无论李登还是焦竑自己都没有任何《笔乘》的地位在《类林》之上的意思。前文说清初人往往怀有编辑一部类书的学术意向，事实上，这也是同时从事“采铜于山”和“辗转稗贩”两手工作的表现，在这一点上，顾炎武与他们都是同道中人。也就是说，顾炎武身在明人类书学的传统之中，这个传统就像他身后的影子，他没有办法与之一刀两断，但在他那里，“采铜于山”和“辗转稗贩”这两手工作之轻重，较之在他的前辈乃至同辈那里，已经清楚斩截得多了——“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7]——这句话不妨就是他针对这个问题的明白宣言。因此，顾炎武终究是在类书学的环伺之下杀出了一条血路，不仅让他自己身后类书的影子，甚至让整个学术世界里类书的影子都逐渐淡漠下去了。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的“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者，顾炎武洵可当之。

---

① 冯廷章：《凡例》，《菉斐堂子史汇纂》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5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10页。

② 杨慎撰，丰家骅校证：《丹铅总录校证》，中华书局，2019年，第1338页。

③ 朱国桢：《涌幢小品自叙》，《涌幢小品》卷首，第1页。

④ 顾炎武：《与颜修来手札》，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29页。

⑤ 李登：《刻焦氏类林引》，焦竑：《焦氏类林》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33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4页。

⑥ 李登：《刻焦氏类林引》，焦竑：《焦氏类林》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33册，第5页。

⑦ 顾炎武：《又与友人论门人书》，黄汝成集释，栾保群校注：《日知录集释》卷首，第17页。

三、结语

本文举列了大量晚明清初类书（学）的例子，像顾炎武等精英士人常常将之斥为“俗学”，但事实上，他们也是从“俗学”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顾炎武在给其友人周篆的回信中说：

> 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则为山覆篑，当加进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务本原之学。①

周篆是晚辈，顾炎武此言是在勉励他，而其言中的“俗学”指的就是类书之学。其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顾炎武又有如下文字：

> 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
>
> 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②

稍一对读就能知道，顾炎武希望周篆远离“俗学”而求之六经，其所谓“俗学”就是“类书家有裨博物，而辞人赋客需之尤亟”③的那一套东西。④他“少年时”其实也身在这个“俗学”的熏染之中，中年以后才渐知其非并体悟出渊源有本的治学之道，因此这不仅是他对别人的勉励，同时也是他自己长期以来的努力方向。

也可以说，当顾炎武青少年时代身为明朝人的时候，他与其他士人在读书治学上并没有多少差异。其《三朝纪事阙文序》一篇就记录了他青少年时代的学术情况：

> 臣幼而多病，六岁，臣母于闺中授之《大学》，七岁就外傅，九岁读《周易》……其明年……（臣祖）命之读古兵家《孙子》《吴子》诸书，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年十一，授以《资治通鉴》……得为诸生，读《诗》《尚书》《春秋》。而先帝即位，天下翕然……臣益长，从四方之士征逐为名……而臣祖乃更诲之，以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⑤

此下又谓：“臣少年好游，往往从诸文士赋诗饮酒……以为书生无与国家之故。”⑥从这个地方以及上引文中“从四方之士征逐为名”云云可知，青年时代的顾炎武是完全融化在明末的士人文化之中的。至于“六岁，臣母于闺中授之《大学》，七岁就外傅，九岁读《周易》”，固然是书香世家的规矩，殆非一般人家可望。不过更重要的是其祖的两处教言，一则命读《孙子》到授以《资治通鉴》，一则以为各种“实学”不可不熟究。这种教导其实是明末士人文化中很流行的讲究，所不同者，如顾炎武等世家子弟可以读到这些典籍的原书，而一般士人则读《古学汇纂》《诸子品节》一类的类书而已。取法有高低，方向则大同。黄宗羲尝回忆说，其父黄尊素“就逮时，途中谓某曰：‘汝近日心粗，不必看时文，且将架上《献征录》涉略可也。’”⑦黄尊素教其子在时文之外看《国朝献征录》，与顾炎武之祖“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的用意也是如出一辙——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共享的一种学问风气。

---

①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周籀书书》，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90页。

② 分别见顾炎武：《亭林余集·与陆桴亭札》《与黄太冲书》，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170、238页。

③ 魏濬：《序》，陈懋学：《事言要玄》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02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1页。

④ 陈宝良早已注意到顾炎武《与周籀书书》中的“俗学”一称。他认为“顾炎武所谓的‘俗学’，是不涉六经的‘心学’末流，它犹如春天的艳花，华而不实”。这个判断是囿于“反理学”这个明清之际思想史解释程式的结果，并没有文献上的依据。引文见氏著：《明末清初“俗学”小考》，《清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⑤ 顾炎武：《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155页。

⑥ 顾炎武：《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155页。

⑦ 黄宗羲：《补历代史表序》，陈乃乾编校：《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页。

明末清初的精英学者斥责类书为“俗学”，这是他们向明人挑战的一面；然而尽管他们的学问已经与“俗学”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从“俗学”中成长起来这个共同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在批评明代学者的同时，又继续视之为同道，甚至将之奉为模范，这是他们仍然继承着明人学问的一面。阎若璩致刘埕的两通书信颇能把这两方面情况展现出来。其一云：

> 注《纲目》地名者，乃一明人案《一统志》注之者。《一统志》无寿河，故云“未详”。此不足怪，独怪胡三省注《通鉴》，其于地理最称详确，于“败之于寿河”之下亦无注，甚矣其难也。至新修《统志》，淮安府山川载寿河，引《十国》《纪年》凡两部书，可谓远胜明人。此近日顾景范、黄子鸿饶为之事，惜先生不见此两人。捍海塘，备载范文正《筑塘方略》，真正有用之书。我问出何书，景范曰：“从范文正文集《堰记》一篇文字录来。”今人远胜明人，鄙言岂无征！①

这段文字体现了对待明人学问的双重态度：纸面上的态度是不太看得起，故谓“今人远胜明人”；纸背后流露出的信息则正好相反，阎若璩似乎并不敢小瞧明人，他是把明人当作一个超越的对象，故而郑重其事地声明其言之有征。这说明对清初的人来说，他们的学问已经“远胜明人”——还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共识。其二云：

> 尝私愿此地缙绅有如马宛斯其人者，文学中有如傅青主、顾宁人其人者，使后生小子感奋兴起，绍明古学，直追金华、嘉定诸先生之遗风，岂不盛哉！岂不快哉！②

其言中的金华自然指的是宋濂，至于嘉定，则指归有光。所以知者，其《移寓杂兴赠陈子寿先生五十首》之三十有句云：“临川嘉定百年中。”自注曰：“谓汤义仍、归熙父两先生之学。”③可知其笔下之“嘉定”必指归有光。又其《与戴唐器》有云：“牧翁推震川为有明第一，南雷先生颇以为否，进瓣香于潜溪。”④这说明宋、归二人常常被明末清初人推为有明一代学问之表率，阎若璩“直追金华、嘉定诸先生之遗风”云云，也是同此风尚的言论。⑤作为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阎若璩博学于文的程度无疑远在一般明代学者之上，但这里他却欣然将宋濂、归有光等明代学者奉为“古学”之表率、追慕之模范（钱、黄二人言中其实亦具此意），那么反观我们对前一段引文的解读，即其中透露着将明人树立为超越对象的意味，也可以由此获得充分的印证。⑥

清初学者既是明代学问的挑战者，又是明代学问的继承人。他们的挑战与继承大概处于有意与无意之间，大体上说，挑战的一面往往是有意识的，而继承的一面则无意识的成分更多。直到雍正朝前后，他们这个明代学问继承人的身份仍然是得到明白认可的。王崇炳于雍正五年（1727）序程明试的《程子樗言》时就说：

> 明时予邑卢御史荷亭著《经学辩论》，萧山毛西河先生极推服其识力，而微嫌其未博。因论胜国博学者推潜溪，继则升庵、弇州，在本朝则西河其人矣。⑦

他很明白地把清初的毛奇龄和宋濂、杨慎、王世贞等明朝人安排在同一个学问系谱之中，就像

---

①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5《与刘超宗丈》，第442页。

②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5《与刘超宗丈》，第448–449页。

③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6，第480页。

④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5，第385页。

⑤ 当然清初人贬斥宋濂等人的时候也不会少，至于贬斥的方式常常就是把他们打回“俗学”原形。例如何焯在致徐葆光信中即谓：“朱子无书不读，事事讲究，非宋潜溪抄袭类书学问可望万一。”何焯：《与徐亮直》，《义门先生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⑥ 阎若璩又尝谓：“或问：‘古学何以为难？’曰：‘不误。’又问。曰：‘不漏。’”《潜邱札记》卷3，第250页。按焦竑《国史经籍志》卷4《类家》小序乃谓：“流览贵乎博，患其不精；强记贵乎要，患其不备。”《续修四库全书》第9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2页。这两点所对应的正是阎若璩的“不误”和“不漏”。可见阎若璩针对“古学”的讲究本来就是明人类书学的支与流裔。既然在同一条赛道上，则以明人为超越目标，岂不宜哉。

⑦ 王崇炳：《叙》，《程正谊集　程子樗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239页。

是前仆后继的同志一样，明人的学问在其言中也基本呈现出正面的色彩。这些都与清朝乾嘉以后的整体认知大相径庭。在乾嘉以后的论述中，毛奇龄等清初博学之士基本都被视为明代空疏之学的反抗者，明代学术整体上也是负面化的，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才是它的固定标签，“博学”二字也在那以后和明人基本沾不上边了。

综合这些现象来看，对理学之外的儒家学问而言，从晚明到清中叶基本上是一个未曾中断过的连续体，换言之，虽然经历了朝代的更迭，从晚明到清初，理学之外的那个学问世界仍然是衔接在一起的，基本上还处在同一脉络之中。在学问的内容与理念上，清初与晚明之间似乎靠得更近，与乾嘉之间则离得更远。而这进一步提示了一个可能的事实：在明清学术史的进程中，真正重要的转变是发生在清代中叶，而并不是我们此前更为重视的明清之际。

References

Ai Junchuan. *Zhongguo yinshuashi xinlu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China). Beijing:Zhonghua shuju, 2022.

Chai Degeng. *Qingdai xueshushi jiangyi*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scholarship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Shangwu yinshuguan, 2013.

Hu Daojing. *Zhongguo gudai de leishu* (Chinese encyclopaedic of antiquity). Beijing:Zhonghua shuju, 2005.

Qian mu. *zhongguo jin sanbainian xueshushi*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eijing:Shangwu yinshuguan, 1997.

Xu Sumin. *Gu Yanwu pingzhua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Gu Yanwu). Jiangsu:Nanjing daxue chubanshe, 2007.

Zhu Weizheng. *Liang Qichao lun qingxueshi erzhong* (Two monographs of Liang Qichao on Qing Dynasty scholarship). Shanghai:Fudan daxue chubanshe,1985.

Traces of Academic Continuit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hrough “Encyclopedias”: A Combined Study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Book History

ZHANG Xun（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zhangshizhai@163.com）

Abstract: Encyclopedi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Ming scholarship and remained a prominent feature within the broader scholarly landscape until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cholars of the early Qing era often aspired to compiling such a compendium as their academic ambition. Gu Yanwu’s famous metaphor of “extracting copper from the mountain” was intended to distinguish his *Records of Daily Knowledge* (*Rizhilu*) from the encyclopedic compendiums that his contemporaries commonly encountered. When confronting Ming scholarship, early Qing scholars were both challengers and inheritors. This implies that for Confucian scholarship beyond Neo-Confucianism,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Qing constituted an unbroken continuum. In terms of scholarly content and ideology, the early Qing stood closer to the late Ming than to the Qianlong-Jiaqing era. This further suggests a possible reality: within the trajectory of Ming-Qing scholarly history, the truly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mid-Qing period, rather than at the Ming-Qing transition—a phase previously accorded greater emphasis.

Keywords: encyclopedia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Gu Yanwu, *Records of Hu Mao Coffins*